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最能促进人类幸福的 财富分配原理的 研究

〔英〕威廉·汤普逊 著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珍藏本)

最能促进人类幸福的 财富分配原理的 研究

〔英〕威廉·汤普逊 著

何慕李 译



商务印书馆

2009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最能促进人类幸福的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英]
汤普逊著;何慕李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珍藏本)
ISBN 978-7-100-06360-9

I. 最… II. ①汤…②何… III. 分配经济学—研究
IV. F0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94506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珍藏本)

最能促进人类幸福的
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

[英] 威廉·汤普逊 著
何慕李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民族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6360-9

2009年5月第1版

开本 880×1240 1/32

2009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5 1/2

定价: 55.00 元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珍藏本)

出版说明

从1981年开始,我馆编辑出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移译世界各国学术经典,立场观点不囿于一派,学科领域不限于一门,所列选的著作都是文明开启以来各个时代、不同民族精神的精华,代表着人类已经到达过的精神境界。丛书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先后分辑编印,迄今为止,出版了十辑,四百种,是我国自有现代出版以来最重大的学术翻译出版工程。



1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是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思想奇葩。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这套丛书一直起着思想启蒙和升华的作用,为我国的思想文化建设做出了贡献。今天,我们各行各业的英才大都受过这套丛书的影响和熏陶。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几代学人心血的结晶。许多学界领袖、著名翻译家和出版家都以深厚的学养、严肃的态度和无私的奉献精神,投身于这套丛书的谋划、厘定和翻译、审校工作。没有他们虔诚的治学精神,也就没有丛书的品质和风格。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也是商务印书馆百年品质的传统。商务早在20世纪初年便出版以严复翻译的《原富》《天演论》为代

表的外国学术名著,20年代又规划出版了“汉译世界名著丛书”,50年代后期更致力于翻译出版外国哲学和社会科学著作,文化大革命中也没有中断,及至80年代,辑为丛书,汇涓为流,蔚为大观。百余年来,商务人以开启民智,昌明教育为宗旨,用文化承续国脉,“日新不已,望如朝曙”。

基于此,我们整体推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珍藏本)四百种,向共和国六十华诞献礼,以襄盛举。同时,我们也是借此机会,向几十年来为这套丛书做出贡献的译者、编者和读者表示崇高的敬意。

中华民族在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始终以开放的心态借鉴和吸收人类文明的既有成果,“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就是佐证。我们会把此次珍藏本的出版看做一个新的开端,并以此为基点,进一步做好这套丛书的规划和出版工作,使其成为一个正在崛起的民族必要的文明情怀,成为一个日渐昌盛的国家必要的文化积淀,以不负前贤,有益社会。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09年3月



威廉·汤普逊的经济理论述评

胡企林

(一)

威廉·汤普逊(William Thompson, 1775—1833年)^①是十九世纪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李嘉图派社会主义经济学家)、欧文的信徒。生于爱尔兰科克郡的罗塞伯利一个地主的家庭。曾在都柏林、牛津、伦敦等地接受中等和高等教育,并曾就学于杰里米·边沁,研读过他的主要著作《道德和立法原理》,因而深受他的功利主义哲学的影响。1822年以后在爱尔兰接受欧文有关合作社制度的宣传,又开始信奉欧文主义。为了宣传欧文主义,他更潜心地研究和利用了李嘉图的经济理论。1824年他出版了自己的主要著作《最能促进人类幸福的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以下简称《研究》),以边沁的功利主义哲学和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为依据,尖锐地批判资本主义的分配制度,并初步论证了合作社制度的优越



^① 汤普逊的出生年份有1775年、1783年、1785年、1788年等几种说法,本文据马克·布劳格等编《经济学家词典》(1983年版)采1775年之说。



性。在《研究》、特别是 1825 年出版的《人类一半(妇女)为反对人类另一半(男人)使她们在政治上、从而在社会上和家庭中屈居奴隶地位而发出的呼吁》中,他还根据功利原则坚决主张妇女应当享有平等权利。1827 年,他发表了《研究》的续篇《有报酬的劳动。劳资权利的协调,或怎样使劳动者得到他们的全部劳动产品》,进一步考察分配问题,阐述自己的政治经济观点,认为合作社运动是消除资本主义剥削、解决社会问题的唯一途径。1830 年,他印行了最后一部著作《根据互助合作、共同占有、平等劳动和平等分配生活享受资料各项原则,迅速而经济地建立公社的具体建议》,为推行欧文的合作社制度提出了详细的规划。除写书外,他还经常为《合作杂志》撰稿,积极宣传欧文的社会主义学说,并担任伦敦合作社组织的重要领导职务。在接受欧文主义以后,他承认自己的地租收入是对别人的劳动产品的“抽取”,并把他的剥削收入中的很大部分用于宣传和推行欧文主义。在 1830 年所立的遗嘱中,他提出把他在科克郡的大部分世袭地产赠给欧文主义组织,把藏书等遗物赠给合作社图书馆。

(二)

《研究》写于 1822 年,两年后在伦敦出版。当时,英国在十八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的产业革命即将完成,资本主义工厂制度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产业革命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同时也产生了严重的社会后果。机器的使用提高了劳动强度,把工人家庭的全体成员抛到劳动市场,因而增强了工厂主对工人的剥

削和奴役。机器大工业的发展一方面使大批手工业者和个体农民纷纷破产,沦为无产者,从而扩大了雇佣劳动大军,另一方面又使大量工人受到机器的排挤而失业,加入产业后备军的队伍。在这种情况下,工人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极为恶劣,实际工资不断降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趋于尖锐。英国已处于第一次普遍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前夕。

汤普逊长期生活在英国资本主义经济发达的一些重要城市,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各种弊害,特别是“在发达的技术和优越的自然条件可以说是竞相造福于人的情况下,千百万勤劳智慧的人民竟不能享受他们自己创造出的产品”的现象深有感触。他认为它们都是由于劳动者缺乏保障,财富分配不平等所造成的,在经济生活中已经产生妨碍不断再生产和财富积累、损害人类幸福的恶果,因此决心研究财富的分配,解决“怎样调和平等和保障,公平分配和不断生产”这一难题。当他在科克郡的文学协会里听到有人宣扬财富不平等的好处,立即加以批驳后,他更深感有必要深入研究分配问题,并把它提到社会面前,因而写成了《研究》这部专著。

在《研究》中,汤普逊继承了边沁的功利主义哲学、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和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把三者综合起来,形成了自己的谋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空想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体系。

在汤普逊手中,边沁的功利主义哲学已从资产阶级道德哲学和政治思想变成了批判资本主义和论证社会主义的理论武器,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已从资产阶级的经济理论变成了反对资产阶级的理论武器,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也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哲学论证和经济论证。



(三)

汤普逊把财富的公平分配看作是政治经济学以至全部社会科学的核心问题,以为社会的根本问题在于分配。

他认为,财富是由劳动生产出来的生活享受的物质手段或物质资料,是任何一种欲望的对象和幸福的基础,“人要想快乐,便脱离不开享受的物质手段,这在一切文明社会里主要就是财富”。因此,生产和拥有大量财富,是人类幸福不可缺少的条件之一,政治经济学的一个伟大目标就是财富积累或每年产品的无限增加。但是,财富并不等于幸福,充裕的财富本身并不足以带来最大的幸福。英国拥有比许多国家多得多的自然资源、机器、住宅、食物以及勤劳智慧的生产者,生产的财富极为充裕,然而生活于英国社会的大多数人并不幸福,他们日趋贫困,非常痛苦,只有少数人愈来愈富,穷奢极欲,就表明了这一点。在他看来,要使充裕的财富真正为人类造福,就必须根本改变财富的分配状况。因为,贫富悬殊是同财富分配状况密切相关的,“目前的财富分配状况趋向于牺牲广大生产者的利益使少数人致富,使穷人陷入更绝望的贫困深渊,使中等阶级沦落进穷人的队伍,以便让少数人不仅能够把真正的国家(它不过是个人的集合体)资本有害地大量积聚在自己手里,而且能够由于这种积聚而支配社会每年的劳动产品。”各种善行和恶德也同财富分配问题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在形成人类性格和影响人类幸福的一切原因中,最重要的是财富的分配,一切条件和关系几乎都取决于财富的分配”。所以,无论对社会还



是个人,“重要的不是仅仅拥有财富的问题,而是财富的正确分配问题”。既然财富的分配和使用比财富的多寡更重要,政治经济学以至全部社会科学就应当把研究的重点放在财富分配问题上,并通过探讨财富分配不平等的弊害和财富分配的自愿平等的利益,揭示“分配的自然法则”,确立理想的财富分配方式。

汤普逊对财富分配问题的极端重视,不仅表现在原书以《论财富的分配》为书名,以《最能促进人类幸福的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为副题^①上,而且贯串在本书各章节的标题和正文之中,构成了全书的中心思想。

古典经济学派很重视分配问题。亚当·斯密把国民财富在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分配作为他的政治经济学的一项主要内容;李嘉图更把分配规定为政治经济学的本题,认为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任务就是研究和阐明支配社会产品分为地租、利润和地租的分配规律。汤普逊的上述观点显然是受到了古典经济学派、特别是李嘉图的影响。

分配是由生产决定的。分配的性质、分配的原则及其形式,也只能是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决定的。财富分配不平等的根源不在于资本主义的分配制度,而在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因而,一般地说,把分配看作事物的本质,并把重点放在它上面,是错误的。

然而,正像李嘉图主要是研究生产的经济学家一样,汤普逊实



^① 英国沃德、洛克和泰勒出版公司 1869 年印行的版本以此副题为书名,中译本据此版本移译,因而沿用了这一书名。

际上是在财富的分配这个提法之下着重研究现存社会的生产关系和未来社会的生产关系的空想社会主义经济学家。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思想,是宣扬只有经济自由的资本主义制度最有利于生产和社会财富的增加,资本家追逐利润、积累资本同生产发展、同整个社会的利益是一致的。而在李嘉图看来,支配分配的规律对利润量、从而对积累的规模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因此他强调要研究分配问题。汤普逊悉心研究财富的分配,然而他没有把问题局限于分配领域,而是在包括分配关系在内的整个生产关系以至政治制度等方面寻找财富分配不平等的原因,并从未来社会的生产关系着眼设计“理想的”分配制度,以之作为现存制度的对立物。

这里要先提一下的是,汤普逊所说的财富的分配,不能只理解为劳动产品的分配,首先应当理解为生产条件的分配。这种生产条件实际上包括物质的生产条件、即生产资料,和人身的生产条件、即劳动力。在汤普逊看来,各种物质资料,如土地、矿藏、原料等等,只要成为“欲望的对象”,并“在它们身上花费了劳动力”,从而“具有一个新的价值”,它们就成为财富品。这样的财富品显然就是生产资料。汤普逊看到,在“文明社会”里,劳动者只具有人身的生产条件,物质的生产条件、即生产资料则完全掌握在资本家手里,生产条件的这种分配对劳动产品的不公平分配具有重大影响。这种见解显然涉及了生产关系问题。

(四)

汤普逊在研究和解决上述中心问题时,以功利主义作为最高



的指导原则。

他在《研究》一书的开头就说：“功利主义，或者说尽可能谋求人类的最大幸福，是本书中时时刻刻记住的、凌驾于一切其他原则之上的指导原则。”他同边沁一样，把功利，特别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作为人们行为的道德标准。

边沁最先把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同功利主义结合起来，把追求一己私利的英国市侩当作标准的人，把这种市侩的本性当作一般人的本性，实际上是把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丑恶本质加以美化。汤普逊则力图以功利主义为指导，利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来批判资本主义，作出社会主义的结论。他说：“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循着他（指边沁——引者）所指出的道路，把政治经济学上确定了 的原理应用到社会科学上，使这些原理和所有其他各部门学问为最能增进人类幸福的财富的公平分配服务。”

作为功利主义基本原则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一种资产阶级的口号，它标榜为了全社会、全人类的利益，实际上是宣扬资产阶级的私利高于一切。但在汤普逊那里，这一口号被赋予了社会主义的内容。他说，“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不是少数人的幸福，而是社会上百分之九十的人的幸福，是“可能有的人类最大幸福”、“社会的幸福和全体的幸福”，尤其是生产者阶级的最大幸福。他看到，在幸福问题上，在最大多数之外的少数人与最大多数的多数人之间存在着矛盾。但他站在多数人一边，认为多数人的幸福优先于少数人的幸福。财富分配不平等、强迫劳动、强迫抽取都将减少人类幸福的总和，甚至会造成普遍的不幸，因为它们减损生产者的生产动机，抑制劳动习惯的作用，从而妨害财富的最大



生产,而劳动产品的减少将使消费减少,享受减少。生产者的劳动产品被人用强力取走,他所损失的幸福将多于掠夺者所增加的幸福;而掠夺者占有别人劳动,也只能获得“动物的暂时的感受”,他不仅将为不义之感和不安全感所缠绕,而减少他的满足,而且,他由此获得的快乐将随需要和欲望的愈益满足而逐渐减少直至无限小。因此,“强迫取走财富、取走劳动生产品的那个掠夺者所得到的幸福,和由于这个行动的结果而损失掉的幸福比起来简直不算什么。”他提出,劳动产品的全部效用为劳动者所享受,才能促进最大的幸福和最大的生产,而在现存制度下,劳动者所能获得的幸福“已经降低到仅仅能使他继续不断努力下去的最低限度”,因而最重要的是根据功利原则来调整分配,改变财富分配极端不平等的状况。汤普逊宣称,“我们的目的……是确定那种能够导致最大的财富再生产和从一切其他来源获得最大幸福的财富分配的方式”,也就是“能够增进人类可能有的最大幸福的,或者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那种分配方式”。他认为这种分配方式将增进生产者阶级的最大量的幸福,同时“表面上有所牺牲”的少数人也将获得真正幸福,所以“全体的真正幸福……将被发现是与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相吻合的”。虽然汤普逊不了解功利的阶级性,因此在他的论述中存在着调和和对立阶级的不同利益的错误倾向,他用掠夺者的内心感受和“效用递减”的观点来解释幸福的大小也是不科学的,但是他的基本着眼点在于谋求增进生产者阶级的利益,还是很明显的。



(五)

汤普逊在运用功利原则来论述财富分配问题时,充分利用了李嘉图的经济理论。他的经济理论的基础,就是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

他继承了李嘉图的价值理论中的科学因素,正确地认为只有劳动才使财富具有价值。他在《研究》中说:“劳动是衡量财富价值的唯一的普遍的标准”,只有劳动才能使天然原料作为财富品而具有价值。他还提出,绝对的劳动量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是财富品的价值的准确标准,在衡量财富品的价值时,还要考虑“使自然资料和自然力量变为有用”的科学技术知识对人们的欲望和爱好的影响。在此书其他一些地方,他用更明确的语言指出:“知识能够经常地发明出改善技术的方法,使劳动能够在产量上或者在质量上或者在双方面有所提高,从而无限地增加作为享受手段的财富”;天赋较弱(有身体构造上的缺点、疾病等)而有特殊技巧的人“在适合于他们的劳动上也许能生产出有加倍价值的有用的东西”。从这里可以看出,他对脑力劳动和复杂劳动在价值生产中的作用十分重视。

他也看出了,在生产过程中生产资料如原料、厂房、机器等都不改变原有的价值量,增加的价值完全是劳动创造的。因此,他不同意边沁等人将资本家看作生产和价值的真正创造力的见解,而明确提出广大群众——“积极的和熟练的工人”——是真正的财富生产者。



基于上述观点,汤普逊在财富应当如何分配的问题上提出了如下的基本思想:既然财富是劳动创造的,一切物品的价值都是生产它们所需要的劳动量决定的,那么,劳动生产者就“有享用他们的劳动产品的绝对权利”,各种财富只有在保证劳动者获得自己全部劳动产品的原则下进行分配,才最有助于人类的幸福;不劳动而占有别人劳动所创造的财富,是背离人类幸福原则的。在汤普逊手里,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从资产阶级的理论武器变成了反对资产阶级的理论武器。

然而,应当指出,汤普逊的价值理论存在着很大的缺陷。他经常把劳动是财富价值的源泉和劳动是财富的源泉这两个不同的命题混为一谈。他片面地认为,劳动是财富之母。同配第提出的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的正确命题相比,这是一种倒退。说劳动是财富的一个源泉,是正确的,说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源泉,则是错误的。汤普逊等人的错误提法在社会主义史上一直影响到拉萨尔派,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对此进行了严正的批判。

(六)

围绕劳动产品的公平分配这一主题,汤普逊还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探讨资本的实质、利润的来源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资本理论、剩余价值和利润理论。这一部分先评述他的资本理论。

汤普逊研究了什么是资本的问题。他对资本作出了两种不同的界说。一种是,资本是没有被立刻消费掉的那一部分劳动产品,是劳动者在生产时使用的物品。这种界说把资本同劳动产品、特



别是同生产资料混为一谈,是不科学的。虽然汤普逊也试图对资本和劳动产品作出区分,但他提出二者最普通的区别在于物品的耐久性,仍未能将它们正确地区别开来。另一种是,资本是能够作为谋利手段的劳动产品,是资本家“从生产者那里榨取未来的大部分劳动产品的手段”。这种界说则又表明,汤普逊已接近于了解到资本的实质。他看到了,资本不是一般的劳动产品,或一般的生产资料 and 消费资料,而是资本家作为谋利或榨取生产者手段在生产过程中使用的那部分劳动产品、特别是生产资料(书中有一处谈到生产时,曾将资本和生产资料视为同义语),它体现着资本家和生产者之间剥削和被剥削的生产关系,虽然他只是用剩余价值的一种转化形式利润来表述这种关系,也未能科学地说明资本家榨取的劳动产品是哪一部分预付资本的产物。

在资本问题上,汤普逊的重大理论功绩是研究了资本(应为生产资料)同劳动的分离,指出了这是资本被用来剥削劳动者的根源。

他说,在靠强力支持的现存制度下,社会分成了两种人,一种是劳动生产者,他们“除了劳动生产力之外一无所有”,另一种人是资本家或资本家阶级,他们拥有土地、粮食、房屋、机器、工具、原料等“现存资本”,即“使……劳动力在生产上起作用的物质资料”。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同劳动力是分离的(汤普逊把这种分离称为“资本和劳动的分离”)。他知道,只是由于生产资料同劳动力的分离,资本家才得以占有生产者的劳动产品。他说:“作为原料或工具使他(指劳动者——引者)的劳动生产力成为有益的那些物质资料都在那些利益和他相反的人们的手



里,这些人的同意对于他这一方面的任何努力是一个必需的先决条件”。这就是说,劳动者为了使用资本家掌握的各种生产资料来进行生产,挣得工资,就不得不将一部分劳动产品偿付给资本家(汤普逊将这种偿付称为加于生产的负担、资本家的“抽取”或掠夺)。因此,“在现在人性还没有改变时,只要社会上积累起来的资本在一群人手里而创造财富的生产力在另外一群人手里,这个被积累起来的资本就将被用来破坏分配的自然法则和使生产者不能享用他们的劳动产品”。汤普逊从经济、道德等方面描述了生产资料同劳动力分离的“可怕”后果,并据此明确指出,“只要有纯粹的资本家阶级存在,社会就必定停留在病态中”。

古典经济学家如亚当·斯密已经意识到,生产资料同劳动力的分离是利润(实即剩余价值)得以产生的经济条件,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但是斯密强调资本的社会作用,宣扬资本家对利润的追求增进了社会公共利益,特别是资本的积累推动了劳动从而促进了社会财富的积累。汤普逊则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发展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明确地提出和反复论证了生产资料同劳动力分离的问题,并站在劳动者一边,强调这种分离所造成的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及其严重后果,这对加深资本理论的研究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与此同时,汤普逊研究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资本同劳动的对立。他说,“资本家凭借着没有保障和强力来统治,把许多劳动者来年的消费资料、生产所必须使用的工具和机器以及他们必须居住的房屋掌握在自己手里,并且最好地利用它们,用它们尽可能便宜地来购买劳动者们的劳动力和未来的劳动产品。资本的利润越大,或者说,资本家使劳动者为他所借用的工具和机器以及所占

